



张謇传

章开沅著

赵樸初敬题

一九九二年十月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张謇传

章开沅 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责任编辑：寿乐英

封面设计：任 轩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謇传 / 章开沅著. — 北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00.8

ISBN 7-80100-691-7

I. 张... II. 章... III. 张謇 (1853~1926) — 评传 IV. K8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8080 号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外新中街 11 号

邮编: 100027 电话: 64153909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销

787 x 1092 毫米 1/16 印张: 26.25 440 千字

2000 年 8 月 第 1 版 2000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2000 册

ISBN7-80100-691-7/Z · 1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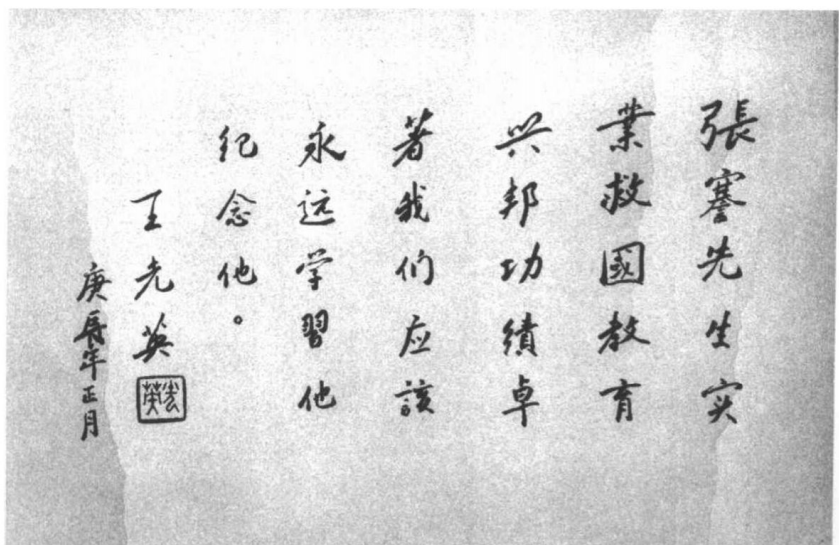
定价: 48.00 元

南通張公季直既榜
魁首復尚西學興達
實業創立學校舉辦公
益澤被鄉里名垂千
秋汝學幼承庭訓先
君每盛譽張公大業記
今記憶猶新茲承贈
武同志寓為題軸不致
却命步均拙字亦借
表衷心敬仰之意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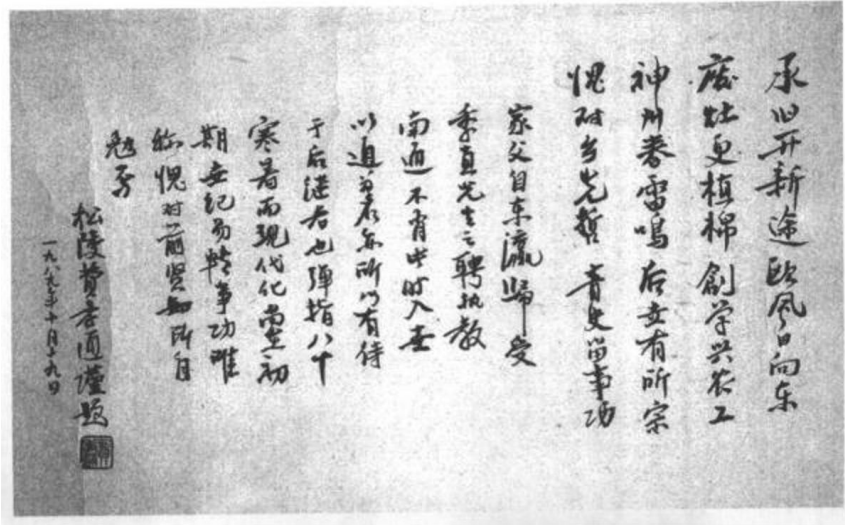
榮毅仁謹題

一九九〇年五月

前国家副主席、前全国工商联主席荣毅仁为重裱后的张謇考中
状元捷报的题词（1990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工商联名誉主席王光英为重祿后的张謇考中状元捷报的题词（20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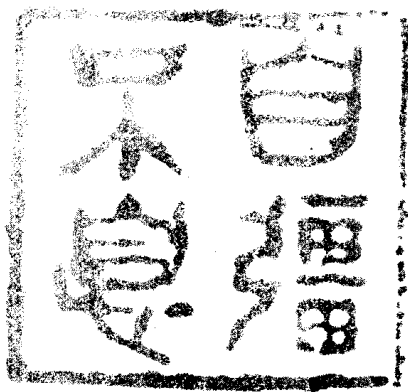
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名誉主席费孝通为重祿后的张謇考中状元捷报的题词（1989年）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为重裱后的张謇考中状元捷报的题词（1992年）



张善像



自序

我在1986年曾经由中华书局出版过《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以下简称《张謇传稿》）一书，其所以称为传稿确实是因为自觉尚不成熟。书稿基本上写成于20多年以前，付印前又由于学校行政事务的繁忙而无暇认真加以修改，出版后虽然不能说是悔其少作，但毕竟遗憾之处甚多。当时就有一个心愿，希望能够加以修订充实，以期有所改进，但10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如愿。

幸好绪武兄去年春天专程来访，希望能对原书加以修改，重新交出版社出版，这才促使我下决心把改写张謇传提上日程。从去年10月开始，断断续续改写了一部分，自觉思路还比较顺畅，论析也颇有新意。今年1月下旬，按惯例到广州女儿家探亲兼避寒，同时也想利用南方的温暖气候抓紧工作，便把已改写的那部分稿子放在衣箱中随身携带。不料正好碰上客运高潮，广州火车站秩序甚为混乱，出站后竟被窃贼把衣箱偷去（几近于抢）。虽经向公安部门报案，并且托人多方查找，始终没有下落。3个月的劳动成果顷刻化为乌有，对于我这样年过古稀的老人来说真是莫大的打击。加以出版社又要求提前交稿，这样更打破了原来从容改写的美梦，我只能在有限的时间作有限的修改。史学本来就是充满遗憾的职业，但是此次由于“天事人心两相违”，给我留下的遗憾也就更为深沉。

当然，既已动笔修改，我还是有自己的谋划，具体说起来有四点：

一是对传主早期生涯的陈述有所补充。1985年修订书稿时，虽然看过台北影印出版的《柳西草堂日记》前面那一部分，即同治十二年（1873年）至光绪十八年（1892年），但由于时间过于仓猝，未能过细做必要的笺注工作，因而没有充分利用。此次动笔修改之前，倒是有充分时间认真阅读并作了笔记，自觉现今这部传记比旧传较为完整、丰满，至少是就早年张謇而言。

二是对张謇在庆军幕府的生活增添了笔墨。张謇在庆军前后8

年，与统帅吴长庆关系相当密切，其间还曾随军前往朝鲜协助解决其内乱，即所谓“壬午之役”。这些年的军旅生涯使张謇受到多方面的锻炼，增加了相当丰富的阅历，从军事到政治、外交都初步显示出青年张謇的干练与才华。他走出了国门，因而也就具有了国际观念或称世界眼光。《朝鲜善后六策》也许并非上乘之作，但从此张謇逐渐形成了自己思维的大格局，即习惯于把中国的事务放在世界全局中来考察，从而决定自己事业的取向与策略。同时，张謇与吴长庆既是宾主关系，同时也是少长关系。过去有些论著过多渲染吴长庆对张謇的礼遇与倚重，其实吴长庆的言传身教与奖掖呵护，对张謇成长与出道的良好影响也不容忽视。因为长庆毕竟是身经百战的儒将，而张謇则是初出茅庐的年轻文士，何况前者还没有进入衰暮昏聩之年。

三是对传主科举生涯的论述有所加强。张謇从同治七年（1868年）开始应试，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大魁天下，前后有26年之久，历经县、州、院、乡会试20多次，仅直接消磨在考场的时间就有120多天，还有穷年累月为准备应试而耗费的大量时间与精力。由于切身的痛苦经验，张謇对科举之弊知之最深，要求变革的心情也最切，所以他能顺应历史潮流，接受新的教育思想，在20世纪初兴办各级各类新式学校。此次修改传稿，结合张謇的应试经历，对晚清科举制度及其具体实施情况稍加铺述，特别是对张謇高中会试一甲一名以后的复杂心情加以论析，目的是在说明科举制度衰亡的必然，以及张謇在甲午以后热心兴办新式教育的思想基础。同时，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张謇在漫长的科举生涯中也并非毫无收益，至少对传统文化的熟悉与理解有所增强，思维的条理化与文字表达（包括吟诗作赋）能力大为提高。而更重要的是，一次又一次连遭挫跌，一次又一次重新应试，并且还要反复经历科场内外的各种痛苦熬煎，这在客观上又反复磨炼了张謇的意志，增强了他对此后各种事业上的挫折的承受力。读者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何以张謇能够在腐朽科举制度的折磨下，不仅没有变成百无一用的科举迷，反而成为精明练达的具有通识的干才？我认为其原因有三：1. 家庭务实教育和经世学风给他的深刻影响，他在熟练背诵经典之余颇能致力于理解，以求学以致用，增加办事才干。2. 长期的游幕生涯，使他不同于一般困守书斋小天地中的迂腐士人。他很早就走出通海，在江南政治、

文化中心江宁地区工作、学习多年，又不断奔走在上海、天津、北京海陆途中，还曾经有山东、汉城的军旅经历与对外折冲的多方面锻炼。社会生活是他的无形老师，正是或主要是这个老师使他没有拘守陈腐而狭隘的经义，反而把熟读的经书作为因应事变的文化资源之一。3. 张謇早年读书虽然受应试教育的严格制约，但在江宁受到桐城派大师张裕钊的影响，合义理、考据、词章为一，所读之书逐渐广泛，除加强史部的阅读外，也增多了子、集两部的涉猎，甚至连《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禁书也不放过。此后，为黄河治理和经营农桑，他还注意西方相关科技书籍的搜集。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可以看作是他最终摆脱科举牢笼的内在根据。

四是对张謇的精神世界作进一步发掘。张謇乃性情中人，其情感之丰富不仅表现于诗文，而且也表现于行为，特别是表现于人际交往。他当然重物质，否则就不会舍翰林清望而兴办实业，就不会因标榜棉铁主义而歌颂棉之白与铁之黑。但是他更重精神，是他率先提出“父教育而母实业”的根本序列；他重视培养人才，而且更为重视涵育人格。他恪守儒学大义，但又绝对地反对道学先生。尽管他60岁以前主要忙于做事，即令是60岁以后依然像蜜蜂和蚂蚁那样忙忙碌碌，但他懂得如何享受人生，尤其是在夕阳无限好的晚年。他热爱生活，热爱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特别是戏剧与其他各种艺术。他的一生不仅追求真，追求善，而且追求美。他对美没有强烈的占有欲，或把美当作包装或炒作自我的手段，他的一切努力在于营造美的文化氛围，培育各种艺术精品，并且把这些美好的东西奉献给南通，奉献给中国，奉献给世界。他没有多少私人的文物珍藏，却殚思竭虑创建并且不断充实南通博物苑。他虽然也有几处私有而并不完全私用的别墅，但同时却营建了为市民所共享用的公园与风景区。他创建更俗剧场，热心戏剧改革；他协助沈寿撰写《雪宦绣谱》，让古老的苏绣焕发青春；他对南通城市建设有较完善的布局，其目的也是为市民的生活与工作提供一个合理而优美的整体环境。总之，如果没有进入其精神世界，就很难真正理解张謇其人。

我研究张謇虽然动手较早，但过去主要是侧重研究张謇其事，顶多是以社会学的眼光考察其梯级式的纵向群体转换，以及甲午以后质变式的横向群体演化。这次修改虽然时间仍较仓猝，但我

决心加强描绘与剖析张謇其人，特别是他的心理活动与精神世界。或许这仍然是浅尝辄止，但毕竟体现了新的思路，希望有若干比我年轻的学者在这方面投入更为富有成效的努力。因为，张謇的精神世界正如他的事业实践，涉及的范围太广，而内容又极为丰富，怎么写也自觉挂一漏万，这一深沉的缺憾只有靠众多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的共同努力，才能逐步给以弥补。事非经过不知难，我现在真是越来越感到很难为张謇写一本真正堪称完善的大型全传，而只有把希望寄托于年轻的优秀学者。

现今中国有没有儒商？需不需要儒商？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重要问题。但如说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张謇是个儒商，大约不会引起任何争论。这不仅因为他早已自我界定为“言商仍向儒”，而且确实是从儒学营垒走进商界，虽已商化而仍然保留许多儒的本色。正如其他许多学派与宗教一样，儒生群体中也有形形色色的区分，有乡愿也有狂狷，有假道学也有真君子，有学而优则仕的猎官族也有匡时济世的大丈夫……，很难一概而论。但如商而冠之以儒，而且又是作为正面的人物类型来理解，则应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以诚信自律的伦理规范，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宿愿的回馈思想，如果要求稍高一点，还应该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与优美情操，即所谓虽厕身商贾而仍不失其儒雅风度者也。当然，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纯粹群体，他们也是形形色色与随时演化，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定商人阶层。正如死人不能复活，现今也无须按昔日的模式来培育单一的儒商，至少是犯不着打着儒商的牌子进行拙劣的模仿。但是应该从清末民初张謇这类真正儒商的身上汲取若干有益营养，无论是现今的商人或非商人。当然我更希望现今的商人能够发扬前辈的某些优良传统，这就是我在现今这本传记中着重从儒商的角度对张謇其人进行解读的用意所在。我不再把自己著作的读者群仅只设定为史学同行，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特别是正在从事实业经营的人，也能了解张謇其人，并且或多或少从这本书中获得某些借鉴。当然我更希望当代的中国商人能够超越张謇，在比南通更为广大的空间成就比大生集团更为宏大的业绩，不仅利己而且利国利民，功在当代，泽惠后世！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由衷地感激南通的两位老友，曹从坡与穆烜，就张謇研究而言，他们都是我的先行者。如果没有他们的指引与热情帮助，我就很难如此顺利地跨进张謇研究之门。

我永远不会忘记，1985年深秋在南通修订《张謇传稿》时，从坡亲自为我安排一处与啬公园相邻的幽静宿舍，连饮食起居都一一细心安排。我也永远不会忘记，当年南通那些老前辈，如费范九、管劲丞、徐海萍等，曾经通过座谈和导游把我引入张謇生时的历史情境。如今除穆烜依然健在，大多均已去世多年，但他们为促进张謇研究所作出的多方面努力，应当被人们永远铭记。

当然，我还要感谢南通市历届领导和各有关部门，如博物苑、档案馆、图书馆等，尽管30多年来历经许多事变，他们对我的热情帮助却始终如一。我每次到南通确实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而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便是张謇研究这个共同事业。在南通以外的朋友中，我要特别感谢南京大学的严学熙，他对通海地区的情况特别熟悉，并曾陪同我前往大丰等盐垦地区参观，对黄海之滨那一大片滩涂开发的历史与现状作了实地考察。在国外的朋友中，自然不能不提到野泽丰、中村英基、巴士蒂、朱昌峻，他们除与我经常有资料交流外，还不断进行相关问题的切磋探讨。尤其令我感动的是藤冈喜久男教授，他虽然年事已高，但却花费许多时间与精力把拙著《张謇传稿》译成日文，交由东京东方书店出版。《张謇传稿》一书是实证性学术专著，引证原始文献甚多，特别是那些用典甚多的旧体诗，其翻译工作量之大与用力之勤可想而知。我也不能忘记我国台湾的一位好友张朋园，是他首先在60年代初就注意到我的张謇研究，并且把我的学术见解介绍到台湾和海外。

从国内有关机构来说，我要特别感谢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与中华书局，1963年至1964年写作《张謇传稿》期间，他们先后为我提供了相当舒适的工作与生活条件，并且还帮助我在北京图书馆善本室等单位借阅了许多珍贵文献。20年以后，又是中华书局的李侃和陈铮率先旧事重提，敦促我把这部冷落多年的旧稿修订出版。如果没有这些好友的关切与鞭策，以我当时行政事务之忙与海内外各种各样稿约之多，《张謇传稿》一书不知何时才能付梓问世。当然，我更要感谢我工作于斯已近半个世纪的华中师范大学及其历史研究所，这里的历届领导与同事数十年如一日对我关怀备至，他们对我的帮助、鼓励与期望，始终是我在学术之途不断前进的鞭策力量。为了现今这本传记的出版，周静云女士承担了全部打印任务，时间紧迫，日以继夜，劳累可想而知。年轻的同事田彤毅然拨冗帮助我校核全书的注释，这也是需要加以

说明的。这大半年，为了保证我顺利完成书稿的修订，贤淑的妻子默默承担全部繁重家务。两个女儿虽然远在广州和太平洋彼岸，但也时时关心我手头的工作和健康。特别是当她们获悉我的书稿被窃以后，其焦急更有甚于我本人，不断当面或来电子信件慰解。我常常感觉，家庭的温馨对于学者著述也是不可缺少的。

最后当然要感谢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他们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承接本书的出版，其卓见远识与慷慨大度都令我钦佩无已。

我还要感谢所有挤出宝贵时间阅览拙著的众多读者，并且再一次恳切地期待着大家的批评指正。

2000年暮春于桂子山麓

引言

很难说近代中国曾经有过什么伟大的预言家，倒是有几位历史人物的言论具有相当高明的预见性。仅以对清末民初这段历史的事先展望而言，有两位前辈的论断就给人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一位是曾经充当曾国藩幕僚的赵烈文。他在同治六年（1867年）六月二十日的日记中曾有一段精彩记述：“初鼓后，滌师（曾国藩）来畅谈，言得京中来人所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余曰：‘天下治安统一久矣，势必驯至分割。然主德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势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师（曾国藩）蹙额良久，曰：‘然则当南迁乎？’余曰：‘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师曰：‘本朝主德正，或不至此。’余曰：‘主德正矣，而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①。这一年，上距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223年，下距清帝逊位民国成立45年，而距袁世凯称帝阴谋破产与各派军阀混战则大致是50年。这一预测并非信口胡言而偶然巧合，它是建立在审慎的对时代潮流与政治局势的判断基础之上的，因此当时即具有令人信服的力量。正因为如此，连功业如日中天而又富于政治经验的曾国藩，听到这番话后也不禁毛骨悚然，发出“吾日夜望死”的哀叹。

赵烈文的预测似乎并未摆脱传统的历史循环论的思维格局，如所谓“统一久矣”、“势必分割”之类语言，即很近似“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他已注意到“风气”的作用以及“德”与“报”之间的互动关系。他虽然不属于早期维新思想家行列，但与龚自珍的新派儿子孝拱关系密切，与早期报人王韬交往亦甚相契，加以旅居上海时间较多，所以并不缺乏当时的新知。他所说的

^① 转引自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58~159页。

“风气”已有新潮流和知识界的醒悟等含义。至于“德”与“报”，则不仅指君民关系，而且包括满汉关系。君之德体现于文治武功，而尤表现为国泰民安，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清朝入主中原两百多年以来建树颇多，但嘉庆以后即已开始走下坡路，所谓盛世徒有其表。道咸两朝外患内忧迭起，清王朝在农民大起义冲击下风雨飘摇，如果没有以曾国藩湘系为代表的汉族地主武装的尽忠“报”国，恐怕早已寿终正寝，所以赵烈文说是“食报已不为不厚”。但清王朝积弊已深，“善恶不相掩”，民怨日增，而且满汉矛盾依然潜在，因此，“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其覆灭仍然无可避免，而为时不过 50 年。

刘厚生最早充分肯定赵烈文其人，认为他的“才识与其人格，确为咸、同年间绝无仅有之知识阶级也”^①。所以曾引用上述赵烈文那段极富前瞻性的议论，作为读者理解张謇前期生涯历史背景的指南。

赵烈文死于光绪十九年（1893 年），所以对于甲午以后的世情与国情都无法了解。而作为下一代“绝无仅有之知识阶级”的则为梁启超，他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发表《过渡时代论》，对于时代潮流和中国的历史发展趋势作出更为深刻的论述。此文开宗明义即指出：“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并且进一步说明：“过渡时代者，希望之涌泉也，人间所最难遇而可贵者也。有进步则有过渡，无过渡亦无进步。其在过渡以前，止于此岸，动机未发，其永静性何时始改，所难料也；其在过渡以后，达于彼岸，踌躇满志，其有余勇可贾与否，亦难料也。”“故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梁启超还断言，每个时代都必然会产生自己的历史人物。他说：“时势造英雄耶？英雄造时势耶？时势英雄，递相为因，递相为果耶？吾辈虽非英雄，而日日思英雄，梦英雄，禱祀英雄。英雄之种类不一，而惟以适于时代之用为贵。故吾不欲论旧世界之英雄，亦未敢语新世界之英雄，而惟望有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之英雄”^②。张謇正是这类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且适于时代之用的英雄，尽管梁启超当时还没有充分

① 《张謇传记》第 55 页。

②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清议报》第 82 期。